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

文学第一集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室

目 录

诗要用形象思维

——学诗札记……………张松如(1)

从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谈文艺

典型问题……………栾昌大(73)

论“莎士比亚化”……………王向峰(100)

论于连·索黑尔的形象……………王 丽(129)

民主革命时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刘柏青(144)

论《狂人日记》……………金训敏(175)

评《〈屈原列传〉新探》……………宋荫谷(194)

唐代传奇小说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探讨 ……王庆菽(230)

略论辛弃疾的词……………喻朝刚(262)

孙悟空形象与《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殷 彤(282)

说 明……………(281)

诗要用形象思维

——学诗札记

张松如

前言：诗的光辉典范与特殊规律

郭沫若同志《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中有句说：“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作诗填词，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活中，确是余事，却不是无关宏旨的小道。纵观古今，横览中外，毛主席诗词在诗坛上确实可以称作“泰山北斗”。这些诗词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些诗词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必须结合着半个世纪以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来探讨，必须结合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钻研。离开了革命斗争的实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理解毛主席诗词是很困难的，是办不到的；而这些也便是毛主席诗词中所反映的现实，所表现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主席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双结合的伟大史诗，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科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主席诗词也如同雄文五卷和一切毛主席著作一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深刻反映，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人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战斗檄文。

但是，必须注意，它又和一般著作有所不同，它又和雄文五卷有所不同，它是诗词，是诗篇，是真正伟大的艺术诗篇。它是在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现实基础上写出又推动了这一伟大现实的诗篇，它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写出又丰富了这一伟大思想的诗篇。这就是说，这里的现实（社会实践）和思想（革命理想）是经过了美学点染和艺术熔铸的，它闪烁着炽热的灿烂的感情色彩和意志光芒。它是现实和思想的形象显现。同样作为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的形式，诗歌和论文，在有其共性的前提下，又各有其个性：论文抽象地解释世界，诗歌具体地说明世界，同时都是为了改造世界；抽象地解释通过证明提炼为概念，具体地说明通过显示凝铸为形象，两者都要达到说服以产生影响，假如说，概念是事物（物质）的本质属性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形象也并不仅仅是由对象的直觉反映即表象所组成，形象乃是不只饱含着思想而且也饱含着情感和意志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它是把思想，把情感和意志注入到由外界引起的感觉而形成的。形象和概念同样都是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的产物，在思维过程中是属于同一序列的东西。而形象则是为感情所修饰为意志所加强了的认识，它赋予以理性以脉搏和呼吸，它是活的、有生命的，这也就是诗。至少，真正的艺术诗篇必须具备这种特质。毛主席诗词乃是诗中的诗，诗的太阳，它是同一切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作品具有着质的不同的无产阶级的诗篇，所以它正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诗的特质的光辉典范。

作为光辉典范，我们来学习和钻研毛主席诗词的精深内

涵，就会发现，有一根巨大的闪光的红线，从始到终贯穿在这些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的诗篇中，它闪耀着战斗唯物主义和革命辩证法的哲理光芒，炽燃着深刻的群众观点的热情火焰，从而洋溢着超群拔萃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力量：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最坚定最彻底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是毛主席诗词的灵魂。

作为光辉典范，我们来学习和钻研毛主席诗词的精美形体，就会认识：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学之一种，诗是现实的艺术掌握，理性的感性显现，它使用形象思维方法，通过加强了、往往是具有一定节奏韵律的语言形式而形成，好的诗篇总是个别形象与普遍本质的统一。所有毛主席诗词都不只是告诉人们一件什么事情或讲述一种什么道理，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具现在栩栩如生的形象中。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是有关诗创作、艺术创作特殊规律的深刻揭示。这规律在毛主席诗词中充分地体现着。尽管曾经有人把形象思维判决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而打入死牢，形成禁区。但理论是灰色的。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创作实践总是遵循着形象思维的特殊规律进行的。

那么，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又是怎样形成，从哪里来的呢？

形象思维这一概念，在中国和欧洲都已源远流长，而把形象和思维两个词明确联系起来，则首见于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1811—1848）的著作。他曾反复说过诗或艺术

是“寓于形象的思维”。（《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及《艺术的观念》）又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讲述，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讲述，他们两人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对于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的意见》）把“形象”作“思维”的定语而形成“形象思维”这一术语，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例子，见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01—1956）在一九三〇年的题为《争取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的演说中，他在批评文艺创作的空洞抽象的现象时说：“这已经不是形象思维”。并对形象思维作了极为精彩的解释，他指出：“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艺术家传达现象的本质不是通过该具体现象的抽象，而是通过对直接存在的具体展示和描绘，艺术家通过对现象本身的展示来揭示规律，通过对个别的展示来揭示一般，通过对局部的展示来揭示全体，从而在生活的直接现实中仿佛造成了生活的幻影”。尔后一般评论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评论家，便往往把科学思维称作逻辑思维，把艺术思维称作形象思维，而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对立。这固然是有道理的，却并不完全确切；这虽然并不确切，却基本上是有道理的。有的同志把这里所说的逻辑思维置代以抽象思维，似乎更比较恰当些。

一、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

散文直说，诗用图画。散文用逻辑思维方法提炼为概念，诗用形象思维方法凝铸为形象。这是诗与文的主要区别，前面已经指出过了。不过，正如列宁所说：“现象比规律丰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实际情况往往更加错综复杂。就

以政论散文和政治抒情诗为例吧,二者有什么相同之点,有什么不同之处,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作出回答,是有助于对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以及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加深理解的。

政论散文与政治抒情诗都是对一定现实政治现象的反映和评价,一定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是它们共同的基础,真理,即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它们的共同内容。假如说政论散文,诸如社论、宣言、声明、演说等等,从基本性质说是属于科学范畴,对世界进行的是科学掌握,但它与自然科学不同,有时也不免热情洋溢,求助于联想和想象,使用着情感的热烈语言和幻想的灿烂形象说话;那么政治抒情诗,则如同一切诗歌一样,属于艺术范畴,对世界进行的是艺术掌握,但决不能为幻想所歪曲,为义愤所淹没,而必然同样燃烧着真理的晶莹火焰,也在判断和思考,甚至有时还直接发议论。

政论散文,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当然是伟大导师以其理论的解剖刀对当年政治形势的客体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经过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达到理论概括;它把任何主观愿望的因素都滤除净尽,发现出完全符合客观现实的运动规律,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并应坚持“争取江西的计划”。这就是科学掌握。但是就在文章的末尾,在结语中论及“革命高潮”的现实性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却曾说: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

你瞧！这不是浮想联翩、激情满怀的诗篇吗？又如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中，讲到长征的意义，是怎么说的呢？据曾经与会的同志回忆，当时毛主席是神采飞扬，富有风趣地说：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在这里，岂不也在流露着热情，并且使用着形象和画面来讲述吗？政治抒情诗，如《如梦令·元旦》（一九三〇年一月）：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很显然，作为诗篇，它重在表达行军感受，抒发革命情意，是精神的斧凿在现实生活的岩石上碰击出的火花。抒情诗的

反映现实，亦即对现实的艺术掌握，则是要把由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固定起来，而这感受依然是由三大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认识，不过它是由意志所加强，被感情所修饰了的，往往演化为联翩浮想，翱翔想象的羽翼，飞架联想的桥索，通过幻想，夸张，使用比兴手法，以至孵育成活的形象。即如《如梦令·元旦》这首小令，同上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名文，不但基本上作于同时同地，而且写的同是当时当地的革命战争，自然具有着内在联系。如果没有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高瞻远瞩，则肯定是看不到这“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绚丽风光的。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而也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如果“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而也“没有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如果不能确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那么是万万写不出这诗意葱茏、诗情酣畅的诗篇的，更万万不能写得这样有绘画美、象一幅鲜明的行军图，有音乐美、象一只雄壮的进行曲。而且，“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一片火样的红旗海洋，岂不正预示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这首小令和那篇名文岂不同样都是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一类右倾悲观论调的答复与驳斥吗？又如《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这里，同样讲的是长征。那视险如夷、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岂不也正是根生于对工农红军本质的深刻认识吗？而这种深刻的认识自然是有其坚实的理智基础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通篇总纲，便是经过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再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将古诫今，至理深情，沉着遒劲，瑰伟豪雄，除非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战略家，除非是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的革命导师，什么人能以这等濡染大笔发出这等警策的叮嘱呢？试看这些抒情的诗句，岂不正是《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副本或续篇，并且把一整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都概括表述了吗？对于现实的生活与斗争，这自然是最精深的评价最宏伟的议论了。

那么，诗与文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呢？那特点，亦即区别，是否只在形式格律上体现出来呢？诚然，格律形式往往成为区分诗歌与散文的重要标志；但这不是本质的问题，更不是问题的本质：有押韵的散文，

也有无韵的诗篇；有八股文，也有自由诗。要区分散文中的情感与形象同诗篇中的判断与思考，必须正确理解诗主达性情，文主发议论这一基本特性，作为思想感情，诗人的与政论家的，与其他任何人的，都没有什么质的不同；对待日常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不该有什么两样。不过诗歌的表现，则必须通过达性情而发议论，思考与判断要形象地显示出来；使读者从“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那一片火样的红旗海洋中，展望到“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胜利前景；使读者从细浪五岭，泥丸乌蒙，暖寒金沙大渡，等闲万水千山的豪情胜概中，去体认“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本质；使读者在聆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谆谆叮嘱当中，领悟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湛深哲理；在这里“有情”亦即“沽名”，思想不是外加进去的，而是从形象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全部诗篇是有机构成，是浑然整体，所谓“必须一气浑成，神完力足，方为合作。”（施补华《岷谿诗话》）至于散文的表达，则是直接发议论，理智直接作用于理智，理智和思想直接碰面，无须以幻想和情感为中介，即使有时不免借助于情感和形象，也只是次要的辅助的手段。它主要的是靠抽象的逻辑线索贯串着，无论是形式逻辑，抑或是辩证逻辑，判断和思考必须遵循着这根线索展开，连同它有时出现的情感的热烈言辞与幻想的灿烂形象，也只是缀在这线索上的花结。就象出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航船”、“朝日”、“婴儿”等形象，就象出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等比喻，统统仍是置于严格的理智控制之下，我们读了它们，只是被那真理的明确的逻辑力量所吸引，使我们更加感到那真理是可信

服的而已。诗歌对生活现实的反映与评价，亦即它的思想与感情，连同它的思考与判断，就不同了，它们主要的不是由一根抽象的逻辑线索所连结，而是必然为一个完整的感性形象统一起来，或者说都必然体现在一个完整的感性形象之中。比如《念奴娇·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但是我们读了它，却仿佛遥望到一位时代巨人，在铁流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中，背靠半壁青天，抽出万丈长剑，指点着“横空出世”的“莽昆仑”，数说它的高寒与功罪，并且要挥手把它裁成三截，分别赠送给欧美东国，让“太平洋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正是通过对昆仑的这种奇特想象和描写，抒发了无产阶级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消灭剥削制度，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又比如《沁园春·雪》，主题思想是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侧面。但诗篇却引导我们进入了一幅气势宏伟、波澜壮阔的江山如此多娇的画面，并看到历代帝王在这“多娇”面前纷纷倾倒，却一一没落，从而突出树起了现代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批判封建主义的主题思想，乃是由读者从这完整的感性形象中领悟出来的，并不曾直说。所有诗篇都是如此，这是它和散文极不相同的特点。

文主发议论，诗主达性情。同样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映与评价，文可直说，重在发现，是科学掌握；诗用图画，重在创造，是艺术掌握。这种区别，古人也曾约略指出过，清人吴乔《围炉诗话》中“答万季埜诗”一段话，正是这样说的：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噉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生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

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已于世乎？”在这里，“意”是属于主观范畴，虽然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王夫之《姜斋诗话》）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所以如果把“意”置代以“社会生活”，便更确当些，而“饭”与“酒”的比喻，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可以直说，因为重在发现，所以“不变米形”；诗歌要用比兴，因为重在创造，所以“形质尽变”；而它们又同是对于现实的反映与评价，“二者意岂有异”？当我们结合着雄文五卷及毛主席其他著作来研读毛主席诗词，于此当更有真切的领会。

那么，在思维过程中，作为认识的结果，为什么诗与文实同形异，而艺术形象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二者意岂有异？”“他们两人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现实的反映，作为不同的观念形态，诗与文的内容，当然没有区别。斯大林说：“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艺术（诗）与科学（文）是不同的观念形态，即不同的思想形式。就其内容说，都是客观物质存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不同的是“形态”即“形式”。从形式上看，艺术（在这里特指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形象性。

同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艺术或者说是诗歌，为什么一定要体现为一个完整的感性形象呢？

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或深奥难解的问题。同样反映现

实，艺术对象与科学对象有没有相对的区别呢？有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矛盾论》）科学把握的是现实整体的某一或某些方面，例如，物理学中的声、光、电、磁以及化学中的有机无机诸种运动规律，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等等，它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把本质从现象中抽象出来。而艺术（这里特指诗歌）把握的则是人以及人的生活，包括三大社会实践以及其综合和总和；也反映自然，人然的自然。艺术对象是统一的整体。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这论断是深刻的。它说明与科学不同，艺术则是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把握由现象到本质的统一体。正是这种内容上的特点要求着或者说决定着它在形式上的形象反映。

二、浮想联翩与联翩浮想

那么，对于现实的形象反映，亦即艺术的形象塑造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的题下，曾写了一段非常优美的序文：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让我们结合着诗篇及当日人民日报所载有关文字，仔细研究研究这段序文，对于理解艺术或艺术创作的特点，亦即诗或诗创作的特点，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试设想看，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就这同一事件，当然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医务工作者可以就防治医疗方面，进行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医理；政治工作干部可以就组织领导方面，进行经验总结，巩固和扩大战果。正如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复斗争，消灭吸血虫病》及《第一面红旗》的报道中所指出的：“消灭血吸虫病是一场关系到改变千百万群众生活、生产习惯的艰巨任务”，“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消灭血吸虫病就有着更加迫切的重要意义”。所以“一九五六年春天合作化高潮到来后，中共余江县委领导人民紧紧依靠着合作化的优越条件，勇敢地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苦战两年消灭吸血虫病的计划，掀起了全面歼灭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他们在防治过程中还发扬了共产主义的独创精神，运用毛泽东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打破了血吸虫病不能根本消灭和不能在短期间内消灭的迷信，为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创造了新的纪录，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当时“某些科学技术人员”曾散布悲观论调，他们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二十多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把它消灭；难道共产党能赤手空拳把血吸虫病消灭掉？”又“有人断言，要把建头村的旧沟填平，消灭钉螺，不等胡子白，也得几十年。”可是“余江县人民有力地驳斥了这些人的悲观论调”：“建头村的人民运用集体力量，在几个月内就填平了全部旧沟，并且修成了一个新的灌溉网”。“在治疗工作上以革命精神打破常规，大胆采用新法治疗。陈旧的三月疗法、二月疗法，二十天疗法，都为新的三日疗法和二日疗法所代替。”这证明“余江县人民说得好，苦战二年胜千古。”象这些便仅仅是就其政治意义和组织活动这一个侧面来论述的，因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

的本质”。（《矛盾论》）这个侧面，所反映的便是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一事件的某种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它们只能是在概念中显现的东西，因而只要依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和彼此联系，加以抽象概述，就可以了。即使把它们摄制为科教影片，也只是把概念加以图解而已。

但诗篇却不能这样平直地写出。诗篇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事件的整体，是由事件所引起的诗人的全部内心活动。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就拿这《七律二首·送瘟神》来说吧，乃是毛主席读报之后，在极度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下所写的。不难想见，伟大领袖长年累月、日夜操劳的便是组织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那囊括宇宙包容古今的博大胸怀中，对人民永远放射着严父慈母般关怀和温煦的光辉。正因为这样，所以当读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才感到无限兴奋，才引起极度激动和喜悦，甚至用不着更多的推理和判断，不言而喻：这是一件大好事情，是大跃进的表现，又给大跃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说明感情诚然源于感性，但是“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所以不仅感觉和知觉可能有情绪的色彩，而且观念和思考也同样有情绪的色彩，所有认识过程都可能引起这样或那样的情绪。不仅如此，这更说明，真正的情感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同时它又加强理智，情与理都属于认识过程，不能把情感与意识分开。虽然情感并不属于意识的内涵，但情感总是由思想引起来的。凡是有情感的作品，便不可能没有思想。而且只有当思想被深刻的情感浸透了的时候，它在文艺作品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诗主达性情。而同时又是对现实的反映与评价。只是这反映与评价却不能象社论与报道